

上海城隍秦裕伯后人的故事

◆ 张渊

记得自我读小学后，祖母就常住我家共同生活了。由于她小时候读过私塾，故能看书看报写信。每当夏天乘凉时，我祖母会教我唱本地山歌、念乡间谚语，她讲的气象谚语特别有道理。夏季的傍晚，若西边太阳似火烧一般的层层艳红，她就会用本地话说“着夜烧，明朝戴笠帽”，意思是特别亮丽的傍晚，第二天是要下雨戴笠帽的。我曾对我说，三林学校是她的祖父、父亲创办的。

三林石刻记先人

我小时候对三林塘的印象，仅仅是夏日吃到的著名的“崩瓜”（皮薄而脆，稍稍一碰就崩开了，故名）和“三白瓜”（瓜的皮、肉、籽全是白的），但又觉得这个三林塘似乎很遥远，弄不清在哪里。

近年，上海地铁11号线通车了，见到其中有个三林站，特别想去探个究竟。2014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先生陪我走进了三林老街民俗馆。在馆外长廊壁上，镶嵌着当地历代名人的石刻。在那里看到了上海城隍秦裕伯像及事迹，一下子就联想起祖母说过的事，于是逐座石刻看下去，看到了创办三林学堂的秦荣光及其子秦锡田，顿时很兴奋，觉得这下可对上号啦！民俗馆负责人让我翻阅了柜子里陈列的《三林历史名人录》，并建议我去召稼楼“秦裕伯纪念馆”看看。数日后，我们去召稼楼，那里陈列了秦家的各代名人，我见到了祖母的祖父、父亲及她堂兄弟们的事迹介绍。后来，又得张乃清先生所著《秦裕伯研究》《上海乡绅秦荣光秦锡田》两本书，内容更详实。

说到秦裕伯，先要说北宋高邮著名词人秦观（字少游），他只愿跟

1897年10月30日，我的祖母秦纫蕙出生于上海浦东陈行镇（距三林塘8里路）。

随苏轼而不跟朝廷。元军骑兵由北往南进军时，秦观的后代逃离高邮，渡长江，又经吴淞口定居上海。秦裕伯是秦观八世孙，住南宋名刹长寿寺旁，苦读二十年成为元末进士。明太祖朱元璋三次发出聘裕伯公的御书，秦裕伯两次不应，第三次勉强上任，没多久就借口高龄多病，告老回乡了，洪武六年病故。朱元璋说“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封他为“上海邑城隍正堂”。

先辈集资办书院

我祖母的祖父是秦裕伯第十七世孙秦荣光（1841~1904），初名载瞻，字炳如，号月汀，生于上海县陈行乡（今浦江镇）。一生除研究学问外，尽力为地方谋利。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联合乡绅捐款捐田，劝募集资创立书院于三林镇，自任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书院为学堂，亲自拟定“新学”科目，除经、史、地、算外尚有英、法文及理化科，延良师、置仪器、辟操场，开浦东风气之先；又争得上海城隍庙大殿等物业为校产，为学堂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在他的努力下，陈行、三林塘、杨思三乡很快办起二十余所小学堂，享誉沪上。秦荣光一生著书很多，著有《补晋书·艺文志》，辑入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另有《补晋书·学校志水利志》《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和《光绪南汇县志札记》等。他编著的《上海县竹枝词》六卷，记述了上海开埠以后的大量史实，1908

她曾对我说，上海的城隍老爷秦裕伯是她们秦家的祖先。

济，号谦斋，现代中医学家。

祖母竟是娃娃亲

我的曾祖父张虞赓（1858~1933），字愚耕，号乐诏，咸丰八年（1858）出生于上海莘庄西河浜。自幼勤奋好学，身处僻乡，有志成才。光绪五年（1880），21岁时考入上海县学，成了一名秀才。但他不爱走仕途，“致力于农田，雨笠烟蓑，手足胼胝，暇则手一编，高吟朗读，声渊渊，如金石，风之晨，月之夕，即景言情……”婚后有两个儿子。

张虞赓与秦锡田是上海县学同学。张虞赓的好友李绮城到三林学校执教，常与校长秦锡田谈起莘庄西河浜张氏“治家之整，待人之诚”。不久，张虞赓亲自将大儿子送到三林学校读书，孩子在校期间“沉潜好学，学日猛晋”。岂料学业未成不幸因病身亡，身为校长的秦锡田心中颇感内疚。后与李绮城同去莘庄西河浜拜访张虞赓，刚进门坐下，张虞赓即介绍在家读书的小儿子张铭西，由于长子不幸夭折，故而不让唯一的幼子出门游学而延师在家执教，并由邻里儿童陪读。12岁的张铭西“恂恂儒雅”，秦锡田十分中意，当即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四女儿秦之蕙（字蕙荪，号纫蕙）下嫁到莘庄西河浜，订下了“娃娃亲”。

出嫁丫头“报主恩”

张铭西，号鸿翥（小名安儿），与秦纫蕙同年，订亲6年后，两人都已

19岁了。1915年正月初二，张虞赓与秦锡田在三林学校为他俩隆重举办了新式婚礼。他俩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婚后生活美满，共生了四个儿子，我的父亲是老二张守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2年夏，我祖父张铭西不幸染上霍乱病，突然离世，年仅26岁。家中一片悲伤，最小的儿子还是个遗腹子！幸而曾祖母稳住了大家庭。据家父张守成回忆，他4岁时父亲去世，7岁搬到莘庄镇新盖的大房子，他的祖父张虞赓仍住在镇郊西河浜，每天早晨上镇喝茶后，到新房子看他们。家中延请了一位松江师范学校毕业的聂姓女教师，学问很好，不但教新式的数学、外文，还教《古文观止》。她除了教张家四兄弟外，还教表亲的四五个小孩。

当时，我祖母娘家经济条件较宽裕。祖母出嫁时，带了一个丫头到张家作为陪嫁。后来又买了一个从安徽逃荒来的小女孩做丫头。数年后，丫头长大成人，祖母就将她俩嫁了出去。我还记得她俩的名字叫秋玲和金菊。秋玲嫁到莘庄以南的颀桥，几十年来，她的丈夫在蚕豆或新大米上市时节，总会骑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的农产品来我们徐家汇天平路的家，看望“太太”（他们对我祖母的尊称）。秋玲在五十岁左右时得了子宫肌瘤，到徐家汇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看病，住在我们家和“太太”相处了一个多星期。另一个丫头金菊出嫁后，丈夫被抓了壮丁，1949年夫妻俩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金菊突然回到上海，辗转寻觅，终于找到了“太太”。我祖母于1990年3月22日仙逝，享年93岁。

（摘自《上海滩》2016年第12期）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37.上海马戏学校成立

1996年，程海宝调任上海马戏学校校长。这年，他46岁。

上海马戏学校的校史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学校）地处（上海）西郊程家桥路188号，占地15018平方米，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拥有适合杂技训练的大型练功厅一个、多功能小型练功厅四个、舞蹈练功厅一个；文化教室10个、13座计算机一个、120座多媒体语音教室一个、102座多媒体阶梯教室一个；拥有图书室、篮球场、200米环形跑道运动场、校园网等多项设施。

这是中国第一所从事杂技、马戏、魔术教学的艺术类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原来隶属于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教育局，文化体制改革后，2001年起隶属于上海市文广集团、上海市教委。担任这所学校专业课程的教师，大多是当年在杂技舞台上卓有建树的明星级演员，他们有着相当扎实的艺术功底，有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建校十多年来，学校向上海和外省市输送了近200名合格的毕业生，就业率为100%，有多人毕业时已成为国内外重大杂技比赛的获奖演员，其中有五十多人次获得国内国际重大杂技比赛金奖。一批节目，如《跳板》《兜杠》《单手顶》《空中飞人》《高空钢丝》等，技巧高难，风格独特，在国际顶级赛场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和国内最高赛场全国杂技比赛中多次荣获金奖。

上海为什么要兴建马戏学校？

时间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出台了《1960年—1967年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规划纲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人们对文化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可在杂技团基础上建立马戏院。”程家桥路62号原是一块空地，上海杂技团租下后，造了简易动物饲养场，豢养一些小动物，以备节目之用。但是，发展马戏艺术，需要有一个大一点的饲养场，用来饲养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



早些时候，上海杂技团草拟过一个扩建方案，扩建饲养场，发展马戏艺术。1961年10月，这个扩建方案落地，驯兽场投入扩建。恰好，团部从东北地区购买的虎、熊、马等动物已陆续运抵上海。几个月后，驯兽场竣工，正好派上了用场。扩建后的驯兽场，新增了驯虎场、驯马场，以及虎房、熊房，配套设施一应俱全。1974年，为了适应上海杂技艺术事业发展，解决用房紧张困难，杂技团在兽房上加层，盖建了一间练功房、一间锅炉房和10间演员宿舍。

兴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上海杂技场，已经使用了十多年，整体建筑日趋老化，原来的设备渐显老旧，杂技团将改扩建上海杂技场列入了改建方案。1980年，方案得到了上级部门批准，改建杂技场的资金，杂技团已经筹措到位，同年4月，改建工程正式开工。经一年多建设，第二年9月竣工。改建后的上海杂技场，基本上能满足文化市场需求，每逢杂技演出，观众纷至沓来，连演连满，座无虚席。设施上去了，人才也要快步跟上，基于这样的思考，建造上海马戏学校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峰的着眼点是要发展、繁荣上海杂技艺术，必须大力培养杂技后备人才，拟议建造的上海马戏学校，可以为上海，乃至全国杂技事业培养人才，使杂技艺术走上正规化、科学化轨道，这将有助于开展对杂技艺术的深入研究。

“黄金十年”给上海杂技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仅1982年到1984年就从一个主要依靠国家补贴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自给率102%的创收单位，演出场次和演出收入屡创新高，成为文化部向全国推广的改革榜样。1985年，杂技团开始自筹资金，1986年10月22日，上海马戏学校破土动工。这项工程建设，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便完成了。

1989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委办公室发文批准上海马戏学校成立。这所杂技专业学校的建成，在全国杂技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杂技艺术家们兴奋地说，中国杂技界终于有了一所专业学校。

4.会谈陷入僵局

全救会成立后的第二天，沈钧儒和章乃器亲自把全救会成立大会的宣言和纲领送给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当局认可，争取合法地位。吴铁城对两人递交的文件毫不在意，口口声声地要求他们取消一切救亡团体活动。沈、章大义凛然地重申：自己并无野心，纯粹是爱国心驱使，从而出面领导运动。在救国会全部的文件中，均没有推翻政府之词，只是想鼓动一致抗日。

吴铁城拒绝了两人递交的文件。第三天，他在大中学校长茶话会上说：“现在有不少野心家，组织了一个什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里面不过是二三十个人在那里包办，说得上一什么全国联合会呢？这个团体简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

3月6日，两广军人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表通电，出兵湖南。南京政府乱了方寸，加紧了是对救国会的监视和破坏。一天，几个特务冲进王造时的寓所搜查，说是他与两广事变有牵连。王造时毫不害怕，从容应对。特务们快快来去。月余，在南京的蒋介石传出话来要见救国会领袖。蒋介石此刻的心情蛮好，他刚平息“两广事变”，迫使桂系陈济棠下台，李宗仁、白崇禧已经妥协。他想调头来解决救国会“捣乱”的问题，会会救国会领袖。蒋介石的邀请，令人难以预料凶吉，许多朋友纷纷劝阻：“蒋介石虽为邀请，可他素以出尔反尔著称，万一把你们抓起来，岂不是自投罗网？”但是拒绝蒋介石邀约，一予蒋介石以话柄，好像胸怀什么鬼胎；二蒋介石要抓你，你也无法逃脱。权衡之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准备前往，以示磊落，并做好不把救国会出卖给任何党派，被党派所利用的准备。

三个人打点行装，从容上路，动身去南京。会一会蒋委员长。蒋介石派戴笠到火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们入住豪华的中央饭店。

这天，蒋介石特意换上戎装，身穿长衫，脸带笑容地在官邸接见了沈钧儒一行三人。他拉着沈钧儒的手，寒暄起来：“沈先生长期为宪政政治奔波，功勋卓著。”沈钧儒平和含笑，也不搭腔。蒋介石见无下文，转向章乃器：“你在银行里工作得很好嘛，肯研究问题，有

事业心。我国金融界难得人才，前途广阔。”他又抓住李公朴的手：“参加过北伐，曾是我党一分子嘛？”

三人找不出什么话回复蒋介石，只让他自拉自唱。一阵沉默之后，言归正传。“我等赴京，十分关切对日准备情况，还想当面聆听你的指示。”蒋介石正襟危坐，腰板笔挺，略微沉吟：“日人要我国不战而屈，试图逼我们屈服。

我屡次重申未到牺牲之最后一步，决不轻言抗日。对于抗日我有十分把握，可以战而不屈！”“委员长，那么我们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华北还要退让呢？”蒋介石脸无愠色，照旧含笑，重弹老调：“诸位，一定知道共产党在陕北，不时捣乱。后方不稳固，何以打胜仗？共产党不要国家，你们可别轻信他们哟。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应该给国家办事。救国会可以存在，一定要在吾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沈钧儒他们明确告诉蒋介石，救国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战，不会服从任何党派。会谈陷入僵局。蒋介石见再谈也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便引他们

到餐厅，让贴身秘书陈布雷作陪，吃顿西餐。

蒋介石迫于形势，害怕拘押沈钧儒等三人，会出现更大的纰漏，决定放三人回沪。三人回到上海不久，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通过李公朴的朋友、市府秘书李大超，邀请李公朴、章乃器、沈钧儒和不久前才从香港回到上海的邹韬奋，到市府做客。用餐完毕，吴铁城露出了真面目：“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请吴市长冷静，不要听信特工人员的情报，无中生非！”李公朴捋着胡子说。“冷静？我是非常冷静的。你们是想另组政府。我现在宣告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命令你们：立刻写好通告解散全救会；把所有印刷品送到市政府，全部销毁。否则，今天你们就进得来出不去了。”吴铁城银丝边眼镜片后的一双小眼睛，直露凶光，平日的学者风度一扫而光。接着，他用嘲笑的口吻对在座的全救会领袖们说：“嘻，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